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再探

王 金 龙

内容摘要：开化纸对于清代内府典籍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以往研究主要以文献考证和纸样分析方法开展，尚未充分利用清宫内府原始档案，因此，有关结论就存在可商榷之处。爬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54 件奏事处汇奏的各部院衙门领用纸张总折档案等可知，在乾隆十九年（1754）至光绪五年（1879）近 130 年间，开化纸几乎在奏事处每年汇奏的纸张总折档案中都会出现，钦天监用开化纸造办进呈皇帝御览及颁发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时宪书，礼部将开化纸用于科举考试中的文会试和翻译会试，缮写四库全书处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也曾少量使用开化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纸张总折档案中关于“金线榜纸”和“连四纸”的记载可知，“金线榜纸”与“泾县榜纸”实为同一种纸张，开化纸并非“金线榜纸”，也非“连四纸”。

关键词：明清档案　开化纸　开化榜纸　金线榜纸　泾县榜纸　连四纸

开化纸是明清时期一种特殊而有名的宫廷用纸，纸质洁白平滑、细薄柔韧。以开化纸精印之书，被视为“清代书籍刻印的楷模”①，受到文献学领域诸多学者的关注，有很多研究成果。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除曾纪刚利用部分清代历史档案进行探讨外②，其他学者则主要从古籍文献和纸样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由于未能充分利用清代内府原始档案，得出的有关结论也就存在可商榷之处。如王传龙认为：“如此著名的一种纸张，它身上却围绕着种种疑团，迄今挥之不去：为何清宫内府档案从不见开化

①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第 89 页。

②曾纪刚：《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文献》2020 年第 2 期，第 4—44 页。

纸之名？……开化纸为何在乾隆朝之后突然不再出现在宫廷用纸之中？”①易晓辉认为：“‘开化榜纸’跟‘开化纸’有许多相似之处，常同时提及……二者应为有一定相似性的两个不同纸张品种。”②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所藏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由奏事处汇奏的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以下简称“纸张总折档案”）等档案的详细梳理，对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一史馆藏清代纸张总折档案

清代，各类纸张是中央及地方各衙门日常办公和编纂书籍等的必需之物，其造办、支领、使用、报销等都有一定之规，因此留存下大量有关纸张领用、报销的档案。清初，纸张的支领尚无一定之制，即“向来纸无定数，支无定期，难以稽核”，故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户部题请“伏乞敕下部院各衙门，确查某衙门应用某样纸张各若干，或一年支领一次，或半年支领一次，于每年正月初旬，自行具题请旨”③。户部的意见得到顺治皇帝批准。此后，各部院衙门基本都于每年正月支领本机构全年开展公务活动所需的各类纸张。如通政使司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题请支领供全年使用的高丽纸一千五百张、本纸五百张、连四纸五百张、江连纸二千张④，内翰林弘文院于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题请支领当年办公所需白榜纸一万张、台连纸二万张、奏本纸二千张、黄折纸五百张、黄榜纸五百张⑤等。各部院衙门于年初支领所需纸张后，还须于年底将使用情况缮写奏折奏闻。年底各部院衙门自行奏报纸张使用情况，让雍正皇帝颇感繁冗。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二十日，陵寝总管永寿等将当年用过

①王传龙：《“开化纸”考辨》，《文献》2015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②易晓辉：《纸落云烟——中国传统手工纸概览》，西泠印社出版社，2023 年，第 404 页。

③张秉贞等：《题为支领纸张事》，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北大移交题本，档号：02-01-02-2133-022。按，本文引用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下文不再注明。

④哈愷等：《题为支领纸张事》，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内阁北大移交题本，档号：02-01-02-2136-015。本文所引用的档案中，用于记录数字的汉字，在写法上存在大写、小写混用的情况，如既有“一”也有“壹”之类。为便于阅读，本文统一使用小写形式。

⑤巴哈纳等：《题为支领纸张事》，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内阁北大移交题本，档号：02-01-02-2140-030。

心红纸张等项缮写奏报，雍正皇帝要求“此等事件如何汇奏之处，着办理军机大臣议奏”。大学士鄂尔泰等提出“嗣后，请将各部院衙门一年用过心红纸张等项，于年底缮折送奏事处总汇进呈，俟发下时交部核销”的意见，并获得雍正皇帝批准。此后，各部院衙门每年的用纸情况由各衙门于年底自行缮折并送至奏事处，由奏事处汇总为一折，进呈皇帝御览，待发下后再由户部题报核销。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在奏事处将各衙门用纸汇总奏报的基础上，乾隆帝又要求“嗣后奏销纸张时，着各该处将上年领用过数目，逐项详细注明具奏”①。

经过雍正十一年和乾隆十二年两次调整，清廷确立了此后奏事处汇奏每年纸张用度的定制，也形成了两种关于清宫心红纸张等物品使用情况的特定档案类型——奏事处汇奏的纸张总折档案暨纸张数目清单，和由户部题报的核销纸张品类数目的题本档案。两相比较，纸张总折档案所记内容更为详细清晰，该档案以各部院衙门为纲，其下逐项列出上年所领用的心红纸张等各类物品的名称及数量，且在大多数物品后面标明用途，在每个部院衙门所列领用各类物品的后面，还写有与前一年该衙门所领用物品数量进行比较的说明；而户部题本则侧重于记录上年各部院衙门所领取物品的总数量，以及与前一年相比各类物品多领少领的数量情况，但并未写明物品的用途。二者各有特点，均具有重要价值，在研究清代开化纸及相关问题时，可以参酌使用，进而得出更加可信有据的结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称“某年纸张总折档案”“某年题本”中的“某年”，指该件档案的题奏时间；而档案内容反映的是上一年的纸张领用情况，并与前年的领用数量作比较。同时，为避免繁琐，本文引用同一件档案时，不重复出注。

目前，笔者共查得清代纸张总折档案 54 件，最早的为乾隆十九年档案，最晚的为光绪五年（1879）档案。按朝代计算，则乾隆朝纸张总折档案 18 件，分别为乾隆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以及五十四年的纸张总折档案；嘉庆朝 19 件，分别为嘉庆五年（1800）、六年、九年至十五年（其中嘉庆十一年有 2 件，内容重复）、十七年至二十五年的；道光朝 10 件，分别为道光二年（1822）、三年、七年、八年、十年、十六年、十八

①索诺木策凌等：《汇奏乾隆三十二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数目事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06。

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的；同治朝 4 件，分别为同治九年（1870）、十年、十三年（该年有 2 件，内容重复）的；光绪朝 1 件，为光绪五年的。此外，还有 2 件不能判定时间的纸张总折档案残件。这些档案均在一史馆宫中各处全宗档案中保存，分存于该全宗内的朱批奏折和杂件两个类项内。每件纸张总折档案的字数在 10000 字左右，相当于各部院衙门领用纸张及相关物品的详细清单，涉及数十个部院机构，内容翔实完备，是研究清代开化纸及各机构办公用纸等问题的原始资料。

以嘉庆十年纸张总折档案为例，该档案内共列出 60 个部院机构，按照档案抄录的先后顺序分别为：实录馆、方略馆、国史馆、会典馆、宗人府、领侍卫内大臣处、内阁、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办理军机处、清档房、吏部、户部、仓场、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都察院、六科、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教习庶常馆、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中书科、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昭西陵礼部衙门、昭西陵关防处、孝陵礼部衙门、孝陵关防处、孝东陵礼部衙门、孝东陵关防处、景陵礼部衙门、景陵关防处、裕陵礼部衙门、裕陵关防处、孝陵总管衙门、景陵总管衙门、裕陵总管衙门、泰陵礼部衙门、泰东陵礼部衙门、孝淑皇后陵寝礼部衙门、泰陵泰东陵工部衙门、泰陵八旗总管衙门、孝淑皇后陵寝八旗总管衙门、内务府总管衙门、上驷院、尚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岗爱马厂、大凌河马厂、奉宸苑、南苑①。这些纸张总折档案内所涉机构相对稳定，但也会随不同时期机构的调整而有所变化，如有一些撤并的机构会删去，有一些新设的机构会增入。每一个机构的后面都开列了领用纸张等物品的类项、数量以及用途。因此，纸张总折档案对研究清代公文用纸、内府用纸、内府编修典籍以及清代手工纸的相关情况都是最原始、最可靠、最丰富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纸张总折档案中的“开化纸”与“开化榜纸”

检视前述 54 件乾隆至光绪时期的纸张总折档案，“开化纸”或“开化榜纸”之名几乎在每件档案（纸张总折档案残件除外）中都有出现，所涉机构主要有礼部、钦天监和缮写四库全书处等。尤其是钦天监，每年都使用开化纸或开化榜纸。首先，清代科举考试中会使用开化榜纸，如乾隆十

①奏事处：《汇奏嘉庆九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嘉庆十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85-044。

九年纸张总折档案中,有礼部领用各类纸张的记载(图见封二):

白棉榜纸六千五十七张、棉连四纸七百三十张、南毛头纸十七万五千四百五十张、呈文纸二万六千五百六十六张、连七纸一万八十张、南红纸一百五十张、中棉红纸二百五十张、大青连七纸一千张、白榜纸二百十张、京红纸三十张、本纸一百五十张、扛连纸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一张、夹板青棉榜纸十五张、开化榜纸一百张、银朱六十斤、靛花五斤、定粉八两、苏木五斤、白芨二斤、水胶五斤、松烟二十五斤。以上各项甲戌科文会试用。

棉连四纸三百六十张、白榜纸二千五百八十三张、呈文纸九千六百四十八张、连七纸四千三十二张、南红纸一百十张、中棉红纸一百张、大青连七纸四百五十张、京红纸三十张、抬连纸一万四千七张、竹料连四纸九千张、本纸五十张、开化榜纸五十张、银朱十斤、靛花三斤、定粉四两、苏木二斤八两、白芨一斤、松烟十五斤、水胶二斤八两。以上各项甲戌科翻译会试用。①

从档案记载看,乾隆十九年(甲戌)由礼部组织开展的文科会试和翻译会试中,均使用了开化榜纸,其中文科会试领用开化榜纸 100 张,翻译会试领用开化榜纸 50 张。

其次,钦天监在造报时宪书时,每年都要用开化纸或开化榜纸。也是乾隆十九年的纸张总折档案中,在钦天监开列领用的纸张等物料中,有"开化纸四千五百二张半。上年所领数内,奉军机处核定,应扣存二千五十四张,满、汉、蒙古七政时宪书用",其后附说明文字:"以上各项因有扣存,开化纸比上年少领三千六百五十一张半。"可见乾隆十七年钦天监领用了更多的开化纸,用于造满、汉、蒙古不同文字的时宪书。乾隆三十三年的纸张总折档案中,也有关于开化纸的记载,同样出现在钦天监领用纸张中:"钦天监:开化纸一千三百三十四张半。进呈时宪书用。"②但在乾隆五十二年的纸张总折档案中,钦天监用于造进呈时宪书的是"开化榜纸",而非"开化纸",记载为:"钦天监:开化榜纸二千八百九十七张半。进呈时宪书用。"③

---

①奏事处:《汇奏乾隆十八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初九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01。

②奏事处:《汇奏乾隆三十二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03。

③奏事处:《汇奏乾隆五十一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07。

乾隆五十四年的纸张总折档案中，也有钦天监造进呈时宪书领用开化榜纸的记载。此后，嘉庆、道光两朝的纸张总折档案中，均可看到钦天监造办时宪书领用开化榜纸的记载。但在同治、光绪两朝纸张总折档案中，用于造办进呈御览及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满汉时宪书等的用纸发生了变化，由开化榜纸调整为泾县榜纸。同治九年纸张总折档案载："泾县榜纸四千一百五十五张。造进呈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满汉时宪书、月五星相距书用。"①光绪五年纸张总折档案载："泾县榜纸四千一百五十五张。造进呈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满汉时宪书、月五星相距书用。"②虽然进呈皇帝御用及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满、汉文时宪书用纸由开化榜纸改为泾县榜纸，但同年钦天监下"造办吉方立成书应领纸张"内仍有开化榜纸，记载为："开花榜纸一千六百五十张。颁发书籍用。"③

除科举考试中的文会试、翻译会试以及钦天监造进呈时宪书以及吉方立成书使用开化纸和开化榜纸外，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也曾少量使用开化榜纸。乾隆四十年，在缮写四库全书处领用的各类纸张中，有开化榜纸一项："开化榜纸一百张。每张裁小页二十四页，共得小页二千四百页，用过一千三百五十页，尚存一千五十页。"④但其后并未写明用途，因此无法判断这 1350 页开化榜纸的确实用场。这条记载也是笔者所见缮写四库全书处唯一使用开化榜纸的记录，而在笔者所见包含缮写四库全书处的纸张总折档案中，自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都有这"尚存一千五十页"的纸张"仍存未用"的记载，也未见该处有新领开化榜纸的记录。

根据纸张总折档案记载，开化纸、开化榜纸与"开花纸""开花榜纸"应为同一种纸张。如据乾隆三十六年纸张总折档案，礼部领出用于该年

---

①奏事处：《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同治八年分心红纸张数目》，同治九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6-0005。

②奏事处：《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光绪四年分心红纸张数目》，光绪五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6-0007。

③见同治九年、光绪五年纸张总折档案。另见奏事处：《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同治九年分心红纸张数目》，同治十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6-0002。

④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一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12。

文科会试(乾隆辛卯恩科)的30项纸张等物品中,“开花榜纸一百张”①便是一项。乾隆三十七年纸张总折档案中,在钦天监开列纸品中有“开花纸二千六百三十九张。进呈时宪书用”②的记载。乾隆四十八年、乾隆五十二年纸张总折档案内缮写四库全书处所列纸张中,也有“开花榜纸,上年旧存小页一千五十页,仍存未用”③的记载。道光三年的纸张总折档案中,礼部领用纸张中有“开花榜纸三十张”的记载,用途是“翻译会试内外帘用”,钦天监领用纸张中也有“开花榜纸”,用途是“造御览及诸王、贝勒、贝子、公主等时宪书”,钦天监专用于造办进呈皇太后时宪书、吉方立成书御览本及副本时,也使用了“开花榜纸”,分别记载为“开花榜纸八十六张”“开花榜纸三十六张”④。

“开化纸”与“开化榜纸”是同一种纸张吗?乾隆三十七年纸张总折档案中,礼部组织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文会试使用总计29种纸张及相关物品,有“开花榜纸一百张”;在钦天监所列的纸张中,有“开花纸二千六百三十九张”。而在乾隆三十七年户部为核销宗人府等39个衙门领用纸张数目的题本中,有“开化榜纸二千七百三十九张”⑤的记载,该题本内关于开化纸及开化榜纸的记载仅此一处,且“二千七百三十九张”这个数量与乾隆三十七年纸张总折档案中“开花榜纸”“开花纸”两者之和相等。这说明在当时,户部认为“开化纸”与“开化榜纸”是同一种纸,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道光七年的纸张总折档案内,在钦天监开列的纸张品类中同时出现“开化纸”“开化榜纸”的名称,一处为“开化榜纸三千九百三十五张。造御览及诸王等时宪书”;另一处为“以上因有闰年分,开化纸多领三百三十二张”,在其后关于“造办道光七年有闰月年进皇太后时宪书

①奏事处:《汇奏乾隆三十五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三十六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911-053。

②奏事处:《汇奏乾隆三十六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23。

③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七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11。

④奏事处:《汇奏道光二年分各部院衙门用过心红纸张总折》,道光三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951-034。

⑤素尔讷等:《题为查核乾隆三十六年分各衙门领用过纸朱等项事》,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内阁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6358-007。

领过纸张等项”中,也有“开化榜纸九十张”,且有“因有闰年分,开化纸多领四十张”①的说明。关于“开化纸多领”的记载列在钦天监开列的所有纸张品类的后面,且钦天监领用的所有纸张中,涉及“开化”二字的只有“开化榜纸”,因此,后面的“开化纸”就是指前面的“开化榜纸”,也就是说,这件档案的记载也表明,道光七年的奏事处官员也认为“开化纸”就是“开化榜纸”,二者之间没有区别。综合前述,在乾隆三十七年、道光七年纸张总折档案的记载中,“开化纸”与“开化榜纸”所指为同一种纸张,由此可以证明,在当时清人的认知中,“开化纸”与“开化榜纸”并无不同,两种名称可以通用。

综上,通过对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纸张总折档案中关于“开化纸”“开化榜纸”记载的详细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清代内府档案中,“开化纸”并未缺席,在礼部组织的文会试、翻译会试中,都曾有使用“开化纸”(“开化榜纸”)的记录;钦天监每年造办进呈皇帝御览及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时宪书,用的也是“开化纸”(“开化榜纸”),而且用量不少,每年达数千张;直到光绪初年,“开化纸”的名称仍然出现在钦天监领用纸张的档案中。(二)从纸张总折档案看,不管是开化纸、开化榜纸,还是开花纸、开花榜纸,用途都是一样的,从礼部、钦天监以及缮写四库全书处的领用记录及相关档案记载来看,开花纸就是开化纸,开花榜纸也即开化榜纸,而且开化纸也就是开化榜纸,均属同一种纸张。

三、“开化榜纸”并非“泾县榜纸”

上一节对乾隆至光绪时期 54 件纸张总折档案中开化榜纸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而泾县榜纸在这些纸张总折档案中的记载比开化榜纸更加丰富,其用途也较开化榜纸更为广泛。

在档案中,泾县榜纸常被记载为“金线榜纸”。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金线榜纸”即“泾县榜纸”,“金线”是“泾县”的谐音,是同一种纸张,直接证据是清代参与《四库全书》校勘的周广业在《过夏杂录》中有“四分全书俱用泾县榜纸”的记载,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永瑢等给乾隆

①奏事处:《汇奏道光六年分各部院衙门用过心红纸张总折》,道光七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5-0006。

皇帝奏折中“现办《四库全书》,俱用金线榜纸”的记载正好契合①。尽管结论无误,叙事方毕竟不同。而笔者在阅读乾隆四十年、乾隆四十一年纸张总折档案时,发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在“缮写四库全书处”和“四库全书荟要处”所领用的纸张中,“金线榜纸”与“泾县榜纸”确为同一种纸张。乾隆四十年纸张总折档案中记载为“金线榜纸”:

缮写四库全书处:金线榜纸四万三百五十张。上年存霉黄、水湿、扎眼、渍脏、纸皮全不堪用者三百五十张。又每张虽有渍脏、扎眼,尚堪选裁小页三四页至八九页不等者九千六十三张,现存不用。外又存堪用小页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七页。本年领金线榜纸纸头四万张,每张裁小页三页,共得小页十二万页,二共小页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三十七页,用过四十万九千七百七十页,尚存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七页。

四库全书荟要处:金线榜纸二万九千张。本年未领。上年存小页三万七千页,整纸二万九千张。此内本年选裁堪用纸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九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得小页二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八页,二共小页三十二万九千六百六十八页,用过十三万二千页,尚存小页十九万七千六百六十八页。又存水湿、霉黄、扎眼等纸四千六百十一张。②

乾隆四十一年纸张总折档案中记载为“泾县榜纸”:

缮写四库全书处:泾县榜纸八万九千四百十三张。上年存小页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七页,霉黄、水湿、纸皮等纸九千四百十三张。本年领八万张,内除霉黄、水湿、纸皮等纸三千二百六十七张,连旧存共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张,俱存本处未用。外选得堪用纸七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得小页九十二万七百九十六页,连旧存共九十四万三千七百六十三页,用过小页八十六万八千八百七十三页,尚存小页七万四千八百九十页。

四库全书荟要处:泾县榜纸二万四千六百十一张。上年存小页十九万七千六百六十八页,霉黄、水湿、纸皮等纸四千六百十一张。本年领二万张,内除霉黄、水湿、纸皮等纸一千六百九十三张,连旧存六千三百四张,俱存本处未用。外选得堪用纸一万八千三百零七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得小页二十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四页,连旧存小页共四十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二页,用去十九万七千页,尚存二十二万三百五十二页。

从上面所引两件纸张总折档案中的记载看,乾隆三十九年缮写四库全书

①易晓辉:《清代内府刻书用“开化纸”来源探究》,《文献》2018 年第 2 期,第 158—159 页。

②奏事处:《汇奏乾隆三十九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11。

处领用的为金线榜纸，当年用过后尚剩余小页“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七页”，而乾隆四十年缮写四库全书处领用的为“泾县榜纸”，且明确记载“上年存小页二万二千九百六十七页”，数量与乾隆三十九年所余数量完全相同，可知此“泾县榜纸”即彼所记之“金线榜纸”。四库全书荟要处也是相同的情况。乾隆三十九年该处“金线榜纸”尚存“小页十九万七千六百六十八页”，而乾隆四十年该处领用纸张中明确记载为“泾县榜纸”，且“上年存小页十九万七千六百六十八页”，数量也与乾隆三十九年所余金线榜纸的数量完全相同。此外，在乾隆四十一年纸张总折档案和乾隆四十一年户部的题本档案中，也是同样情况。乾隆四十年各部院衙门领用“金线榜纸”的数量为平定准噶尔方略馆 200 张，国史馆 500 张；而领用“泾县榜纸”的数量为缮写四库全书处 80000 张，四库全书荟要处 20000 张，纸张总折档案中记载乾隆四十年各部院机构领用的“金线榜纸”和“泾县榜纸”总计 100700 张。而在乾隆四十一年七月署户部尚书英廉题报乾隆四十年各部院机构领用的各类纸张总数中，有“金线榜纸一十万七百张”①的记载，且该题本内并未列出“泾县榜纸”。这说明，“金线榜纸”与“泾县榜纸”确实是同一种纸张，只不过在档案中使用了不同写法，而且当时上至皇帝和各部院大臣，下至各部院机构具体办事人员，都明确知道相关文书中两种不同写法表示的是同一种纸张。

那么，泾县榜纸是开化榜纸吗？下面进一步通过纸张总折档案的原始记载来探寻答案。

乾隆至光绪各朝的 54 件纸张总折档案中，金线榜纸在一些部院机构领用的纸张品类中经常出现，这些机构主要包括：方略馆、文颖馆、圣训校勘处、会典馆、平定准噶尔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馆、国史馆、实录馆、五朝国史馆、诗经馆、功臣馆、缮写四库全书处、四库全书荟要处以及治河方略馆等。从这些机构名称看，凡使用金线榜纸的基本都是与编书修书相关的机构。

国史馆使用金线榜纸缮写满汉大臣列传、年表等史书的正本。乾隆十九年纸张总折档案中，五朝国史馆下有“金线榜纸一千四百张。缮写大臣列传、年表等用”。乾隆三十二年，国史馆下列有“金线榜纸六百张。旧存一百张。缮写正本并原传，用过三百九十二张，尚存三百八张”。乾隆五十四年，国

①英廉等：《题为核查乾隆四十年分宗人府等衙门领用过纸朱等项数目事》，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内阁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6798-003。

史馆下记载:“金线榜纸一千五百二十九张。旧存七百二十九张。本年缮写各种清、汉书篇并衬页皮面等项用一千二十一张,现存五百八张。”①嘉庆十五年,国史馆下记载:“泾县榜纸三千五百张。旧存一千九百九十九张。缮写正本并各种清、汉书篇衬页共用三千三百一十三张,仍存二千一百八十六张。”②光绪四年使用数量更多,“旧存泾县榜纸三千九百五十二张。本年缮写各种正本各项皮面用完”,“泾县榜纸一万张。本年缮写各种正本书籍皮面等项用过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张,仍存二千六百九十二张”。

方略馆用金线榜纸缮写方略及相关书籍的正本。根据纂修方略内容的不同,纸张总折档案中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馆、方略馆、治河方略馆等不同名称,但都使用了金线榜纸。乾隆四十二年,平定准噶尔方略馆使用金线榜纸 950 张:“金线榜一千七百张。旧存五百张。缮写《一统志》《金史》《元史》《明史》《本纪》《明纪纲目》《蒙古源流》《两金川方略》《临清纪略》《热河志》《西域图志》各正本共一百九十本,用纸九百五十张,现存七百五十张。”③乾隆四十六年,平定两金川方略馆使用金线榜纸 1135 张:“金线榜纸一千四百四十三张。旧存六百四十三张。缮写《平定两金川清汉方略》《一统志》《盛京通志》《满洲考》《辽史》各正本一百八十一本,共用纸一千一百三十五张,现存三百零八张。”④嘉庆十一年,方略馆为缮写方略使用金线榜纸 538 张:“金线榜纸五百张。旧存五十张。缮写《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本及抽换篇页,共用五百三十八张,现存十二张。”⑤嘉庆十九年,治河方略馆用金线榜纸缮写《治河方略》等书:“金线榜纸二千张。旧存二千九百八十五张。缮写《唐文》正本并《治河方略》正本,共用过三千三百五十张,尚存一千六百三十五张。”⑥

---

①奏事处:《汇奏乾隆五十三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五十四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08。

②奏事处:《汇奏嘉庆十四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心红纸张等项数目清单》,嘉庆十五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3-0004。

③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二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07。

④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六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七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1-0010。

⑤奏事处:《汇奏嘉庆十一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嘉庆十二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4-0008。

⑥奏事处:《汇奏嘉庆十九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嘉庆二十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4-0009。

玉牒馆也大量使用金线榜纸来缮写清皇室族谱——《玉牒》。乾隆三十二年以前,《玉牒》用白鹿纸缮写,乾隆三十二年后改用金线榜纸:“国家累洽重熙,天潢衍庆,麟趾增祥,百倍曩昔,若仍用白鹿纸三层托裱,幅帙未免过厚,难于展阅……旧制尚未尽善。谨查,凡纂辑实录、国史,俱用金线榜纸缮写,坚致洁白,较白鹿纸更为贵重,似宜酌量变通,以垂永久。臣等谨拟,此次纂修玉牒,缮写正副本一概皆用金线榜纸,无庸三裱。”①此后每次纂修《玉牒》都需大量使用金线榜纸。而档案中也留下了纂修《玉牒》使用金线榜纸的有关记录。光绪十三年底,玉牒馆向户部发去咨文,称“本馆此次自开馆以来,共领过金线榜纸十五万四千九百张,今缮写正副本各书并看页、副页,更换篇页及缮写正副各小档并粘签发族底档及添办八旗觉罗红名男女底档等项,俱用无存”②。

实录馆用金线榜纸缮写实录的正本。嘉庆九年,实录馆使用金线榜纸近30000张:“金线榜纸二万八千五百张。旧存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五张。恭缮正本用过二万九千九百五十八张,尚存一万二千零九十七张。”且在其上用黄色签条标注“金线榜纸比上年多领三千五百张”,说明嘉庆八年实录馆领用金线榜纸也有25000张。道光二年,实录馆也领用金线榜纸,主要用来抄写实录正副本:“金线榜纸。系恭缮正副本用,旧存八千五百八十一张,新领一万八千张,用过一万七千一百九十五张,尚存九千三百八十六张。”光绪四年,实录馆使用23000余张金线榜纸缮写实录正副本:“泾县榜纸。系缮正副本用,旧存四千七百七十张,新领二万五千张,用过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三张,尚存六千六百三十七张。”

会典馆用金线榜纸缮写会典满、汉正本。嘉庆八年,该馆虽未新领用金线榜纸,但使用了旧存的金线榜纸:“旧存金线榜纸二千张。缮写清、汉正本用过一千七百八十七张,尚存二百十三张。”③。嘉庆二十三年,会典馆也使用了较多的金线榜纸:“金线榜纸八千张。旧存三百四十张。缮写正本用,尚存四千七百零三张。”④道光元年,会典馆领用纸张品类中有“金线榜纸一万张。

---

①玉牒馆:《为纂修玉牒改换金线榜纸并黄箱改为黄柜事奏折》,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旧整宗人府奏稿,档号:06-01-006-000004-0001。

②玉牒馆:《为并无余剩纸张行户部颜料库事说堂稿》,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旧整宗人府说堂稿,档号:06-01-002-000881-0058。

③奏事处:《汇奏嘉庆八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嘉庆九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3-0009。

④奏事处:《汇奏嘉庆二十三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嘉庆二十四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3-0018。

旧存七百九十三张。缮写正本用，尚存五千七百八十三张”①。

缮写四库全书处大量使用金线榜纸缮写北四阁《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该处领用“金线榜纸八万三千张。内除霉黄、水湿、纸皮、扎眼、污损全不堪用者三百五十张，又每张虽有污损、扎眼，尚堪选裁小页三四页至八九页不等者九千零六十三张，此项纸张现存该处。外其堪用者七万三千五百八十七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得小页八十八万三千四十四页，用过五十七万三百七页，尚存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七页”②。乾隆四十九年，该处领用泾县榜纸“整纸五万张，并前存，二共九万九千六百十二张，内打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张，每张裁十二页，计小页一百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六页，并前存小页，二共一百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三页，内除用去一百九万三百五十页外，仍存小页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三页，存整纸五千八百十四张，其上年旧存水湿、霉黄、纸皮、扎眼等纸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二张，并旧存每张裁六页小页纸七十二页，及旧存每张裁二十页小页纸二百五十三页，俱仍存未用”③。

四库全书荟要处也使用金线榜纸缮写《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三十八年，该处领用“金线榜纸五万张。内选用二万一千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得二十五万二千页，用过二十一万五千页，尚存三万七千页，又存未裁整纸二万九千张”。乾隆四十三年，该处的泾县榜纸“新领四万张，内水湿、霉黄、扎眼、纸皮等纸五百张，连旧存七千二十六张，仍存本处未用。外选得堪用纸三万九千五百张，每张裁小页十二页，计得小页四十七万四千页，连旧存小页五十四万九千一百八十八页，用去四十三万四千页，现存小页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页”④。

通过梳理纸张总折档案中有关金线榜纸和泾县榜纸使用机构、用途的记载可以明确，使用金线榜纸的主要是各修书编书机构，尤其是缮写四库全书处、四库全书荟要处、实录馆、玉牒馆、会典馆、国史馆、方略馆等机构大量领用金线榜纸，用于缮写北四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

---

①奏事处：《汇奏道光元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总折》，道光二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5-0003。

②奏事处：《汇奏乾隆三十八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03。

③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九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五十年五月初十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26。

④奏事处：《汇奏乾隆四十三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2-0021。

《清实录》、乾隆三十二年以后所修《玉牒》、满汉文《清会典》、大臣列传正本及各种方略和纪略正本等清内府重要典籍，很少用于日常公文或档案书写。而开化榜纸仅在礼部组织的会试、翻译会试中少量使用，并在钦天监每年造办进呈皇帝御览及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时宪书时使用。缮写四库全书处虽然也领用了开化榜纸，但仅在乾隆四十年使用，且数量极少，总计不到57张。不论从使用数量、范围还是用途，与金线榜纸相比，开化榜纸均远不及。尤其是乾隆四十一年纸张总折档案中，“泾县榜纸”和“开化榜纸”作为两个纸种并列于缮写四库全书处所开列的纸品内，而道光十年、十六年、十八年的纸张总折档案内也有类似情况，在钦天监下并列写出“金线榜纸二百二十张，开化榜纸三千九百三十五张（黄色签条：比上年多领三百三十二张半）”①；“金线榜纸二百二十张，开化榜纸三千六百二张半”②；“金线榜纸二百二十张，开化榜纸三千九百三十五张”③。因此，不论是从开化榜纸和金线榜纸的使用机构、使用数量、使用途径，还是从乾隆至光绪年间的纸张总折档案内的记载方式来看，开化榜纸都不能与金线榜纸等同，二者并非同一种纸张。

四、“开化纸”也非“连四纸”

在古籍文献研究领域，许多精美的清代殿本古籍常被描述为“开化纸精印”，而开化纸即为连四纸：“所谓连四纸，即人们常说的开化纸，清宫档案对开化纸基本没有记载，但据大臣奏折、皇帝谕旨提到连四纸印制的图书，如《御选古文渊鉴》等，所用即为开化纸，故连四、开化，其名虽异，其义则一。”④但也有研究认为，“近人（如陶湘、周叔弢、黄永年等）所谓清三代殿本之‘开化纸’，极可能是一种讹呼，它的真实名称（据内府档案记载）为‘连四纸’，而非明人所谓开化纸”⑤。那么，开化纸与连四纸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纸呢？下面通过纸张总折档案对连四纸的记载回答此问题。

---

①奏事处：《汇奏道光九年分各部院衙门用过心红纸张总折》，道光十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14-087。

②奏事处：《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道光十五年分心红纸张数目》，道光十六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5-0015。

③奏事处：《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道光十七年分心红纸张数目》，道光十八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5-0005。

④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⑤王传龙：《“开化纸”考辨》，《文献》2015年第1期，第23页。

连四纸在纸张总折档案中的记载也较为丰富，而且名目繁多，使用机构也较广泛。名目主要包括连四纸、清水棉连四纸、竹料连四纸、白棉连四纸、矾连四纸、棉连四纸、青水棉连四纸、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上号洁白竹料连四纸、洁白竹料连四纸、清水连四纸、竹料洁白带边连四纸、上号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粉连四纸等 10 余种。使用机构主要包括实录馆、缮写四库全书处、四库全书荟要处、国史馆、文颖馆、户部、礼部、兵部、刑部、理藩院、都察院、六科、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近 20 个。这些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修书机构，如国史馆、实录馆、文颖馆、缮写四库全书处等，主要将连四纸用于编修书籍；另一类则为各部院衙门相关机构，如六部以及理藩院等，主要将连四纸用于日常办公。

纸张总折档案中不仅记载了连四纸的种类和使用机构，也记录了连四纸的用途、数量。从用途看，国史馆用白棉连四纸裱褙各种书籍皮面、书面绫皮，用矾连四纸装订正本书面；文颖馆用清水连四纸裱褙黄绫书面；户部用连四纸录写谕旨以及科抄咨呈号簿；礼部使用的连四纸名目较多，有连四纸、棉连四纸、清水棉连四纸、竹料连四纸、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上号连四纸等，用连四纸刷印会试录、殿试登科录，用棉连四纸造报奏销册及稿案文移，用洁白竹料连四纸刊刷会试录，用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刷印登科录，还用上号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专造供进呈用的殿试登科录，用上号连四纸造专供进呈用的会试录等；兵部用连四纸造进呈用的武科举题名录和刷印武登科录、武会试录，并用于缮写黄册；刑部用连四纸刷印秋审、朝审册；理藩院用连四纸造黄册；都察院、通政司将连四纸用于日常公文文稿的缮写；六科用连四纸缮写黄册；太常寺用竹料连四纸糊祝版面子，用白棉连四纸写奏销钱粮黄册；光禄寺用清水连四纸和连四纸缮写黄册；鸿胪寺用连四纸写告示；实录馆用清水连四纸、粉连四纸装潢书籍、托裱绫绢；缮写四库全书处用清水连四纸刷印聚珍板书籍、装潢陈设书籍、入衬全书并托裱素绸面页等；四库全书荟要处用清水连四纸托裱素绸面页。从数量看，各机构使用连四纸的数量自数十张至数十万张不等。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缮写四库全书处为刷印聚珍版书籍及入衬全书，使用了大量的清水连四纸：“清水连四纸二十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张二页又零六分。上年旧存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七张二页，本年新领十一万八千九百一张又零六分，二共二十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张二页又零六分，刷印聚珍版书籍并入衬全书用去十四万五百九十四张二页又零六分，现存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张。”“清水连四纸

八万四千二百三十张半。上年旧存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张，本年新领二万一千八十六张半，二共八万四千二百三十张半，刷印聚珍版书籍并入衬全书用去六万一千七百二十六张半，现存二万二千五百四张。”①使用数量较多的还有刑部，乾隆五十一年，刑部使用连四纸15900余张：“连四纸二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张。旧存九千五百五十六张。刷印秋审、朝审黄册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张，现存九千六百二十四张。”嘉庆十二年，刑部使用连四纸24500余张：“连四纸二万张。旧存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张。刷印秋、朝审册用过二万四千五百十八张，尚存八千二百三十二张。”②其他部院机构使用数量多在数十至数百张，相对较少。

另将纸张总折档案与户部核销纸张题本档案中所记各种纸张的数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纸张总折档案中所记载的各部院衙门领用的某类纸张的总和与户部题本中的数量是一致的。如前述关于乾隆四十年领用金线榜纸的数量，纸张总折档案中缮写四库全书处等4家机构领用的总数为100700张，而户部题本中所记的金线榜纸数量也为“一十万七百张”。乾隆四十一年纸张总折档案中，刑部领连四纸6000张，理藩院领连四纸300张，都察院并十五道领连四纸440张，六科领连四纸260张，通政司领连四纸80张，太常寺领竹料连四纸200张、白棉连四纸130张，光禄寺领清水连四纸1700张，鸿胪寺领连四纸100张，缮写四库全书处领清水连四纸3638张、竹料连四纸239张，户部领连四纸3523张，礼部领洁白竹料连四纸66张、竹料净白带边连四纸111张、清水棉连四纸400张，兵部领连四纸1800张。将这些不同品类“连四纸”的数量相加，总数为18987张。而在乾隆四十一年户部核销上年领用纸朱等物品的题本中，有关乾隆四十年领用连四纸数量的记载为“连四纸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七张”。纸张总折档案中各部院衙门领用的连四纸品类虽然较多，但在户部看来，各类不同名称的连四纸一律都可统称为“连四纸”。

关于连四纸的细分种类，乾隆三十六年官修满汉合璧辞典《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故宫博物院郑珣对其中的满文进行了翻译注解，可知连四纸是“过滤抄造成尺幅大小如四张纸一样长宽的纸”，清水连四纸是“将树皮粉碎后在清澈的水中浸泡过滤抄作的连四

①奏事处：《汇奏乾隆五十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总折》，乾隆五十一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4-0012。

②奏事处：《汇奏嘉庆十二年分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项数目总折》，嘉庆十三年，宫中杂件，档号：04-07-001-000054-0007。

纸”，竹料连四纸是“将竹子粉碎后在水中浸泡过滤抄作的连四纸”①。据此来看，连四纸的名称只与纸张的尺幅有关，与造纸的原料、方式及纸张质量并不直接相关。而竹料连四纸是以竹子为原料抄成的纸；清水连四纸是将粉碎的树皮在清水中浸泡过滤抄作的连四纸；前面如再加上“洁白”“净白”“上号”等词，则是指更为优质的连四纸。

综合前述，在清代，连四纸是一种使用较为广泛的书籍用纸和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公文用纸，其主要用于刷印武英殿聚珍版书籍、装潢书籍、托裱书籍绫绢、缮写黄册，刷印登科录、会试录等，少数部院机构也用少量的连四纸作为公文用纸，用于行文稿案、抄写谕旨、抄录咨呈及发告示等。特别是缮写四库全书处在刷印武英殿聚珍版书籍时，使用了大量的连四纸，这也证明部分研究者（如王传龙）已得出的现常被称为用“开化纸”印制的精美的殿本书实质上就是连四纸书，“开化纸”是对“连四纸”的讹称的结论。“连四纸一系与榜纸一系泾渭分明，各自独立不相淆混”②，开化纸（开化榜纸）与连四纸不是同一种纸张，二者不能直接等同。一是二者使用范围不同。开化纸仅限于礼部、钦天监、缮写四库全书处等几个少数机构使用；而连四纸的使用要广泛得多，达到近 20 个部院机构。二是数量相差较大。使用开化纸数量最多的为钦天监，每年仅三、四千张；而连四纸的使用数量则大很多，仅缮写四库全书处就使用数十万张，刑部每年也有数千至数万张的用量，其他机构加起来也为数不少。三是用途明显不同。纸张总折档案中，开化纸主要用于钦天监造供御览及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时宪书；连四纸则主要用于纂修书籍，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籍、其他书籍的装潢托裱以及相关部院缮写黄册，当然也被少数机构用作公文用纸。四是分别为独立纸种。不管是在纸张总折档案中，还是在户部每年核销纸张的题本中，开化纸、连四纸均是作为独立纸品出现的，且同时出现在礼部开列的纸品中。乾隆四十一年署户部尚书英廉奏报的核销乾隆四十年各部院衙门纸张的题本，记录的纸张种类有 31 种：高丽纸、黄高丽纸、金线榜纸、榜纸、黄榜纸、红榜纸、蓝榜纸、开化榜纸、呈文纸、黄呈文纸、黄笺纸、川连纸、毛头纸、毛边纸、双抄呈文纸、黄本纸、红本纸、连四纸、磁青纸、连七纸、黄连

①郑珣：《从满文辞书〈御制增订清文鉴〉看清代纸张的使用与制作》，《故宫学刊》第二十四辑，故宫出版社，2023 年，第 204 页。

②曾纪刚：《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文献》2020 年第 2 期，第 43 页。

七纸、青连七纸、太史连纸、红纸、巨红纸、裱料纸、白鹿纸、扛连纸、南砂纸、京高纸、毛六纸，“开化榜纸”与“连四纸”并列于其中，也说明二者并非同一种纸张。

结语

梳理一史馆藏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纸张总折档案等对“开化纸”“开化榜纸”“金线榜纸”“泾县榜纸”“连四纸”的原始记载，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这些纸张的使用机构、用途、数量并进行比较，就文献学领域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开化纸”问题，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开化纸和开化榜纸在清代内府档案中并未消失不见。自乾隆十九年至光绪五年，开化纸和开化榜纸一直出现在奏事处每年汇奏各部院衙门领用过心红纸张等物品的总折档案中，在礼部组织的科举文科会试、翻译会试和钦天监造办进呈御览及颁发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时宪书时使用，乾隆四十年缮写四库全书处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也曾少量使用开化榜纸。相较于金线榜纸和连四纸，开化纸虽然用途不广、用量不大，仍在清乾隆至光绪时期的近 130 年间持续使用，这对进一步厘清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有重要价值。

（二）开化纸和开化榜纸为同一种纸张。以往研究常将开化纸与开化榜纸视为两种纸张，如称开化榜纸是“外观与开化纸极为相似，质地细腻，亦极洁白，柔软韧性强，但较开化纸略厚，帘纹较宽，颜色略显发乌，质量次于开化纸”①的一种上等纸品。但从清代纸张总折档案的记载来看，当时各部院机构相关人员在记载过程中，认为“开化纸”就是“开化榜纸”，二者虽异名，但实属同一种纸张。

（三）开化榜纸并非金线榜纸。过去许多专家认为北四阁《四库全书》所用的“开化榜纸”，已经易晓辉判断，实为金线榜纸（泾县榜纸）。而从纸张总折档案中的记载来看，“金线榜纸”与“泾县榜纸”确为同一种纸张，“开化榜纸”与“金线榜纸”确为不同的纸张。金线榜纸使用机构多、使用范围广、使用数量大，且多用于清内府修书各馆缮写各类典籍的正本，而开化榜纸使用机构少、范围窄、数量小，仅限于礼部、钦天监等少数机构。同时，纸张总折档案中，开化榜纸与金线榜纸经常作为独立纸种出现，尤其是道光朝纸张总折档案内钦天监下每年领用的纸张中，金线榜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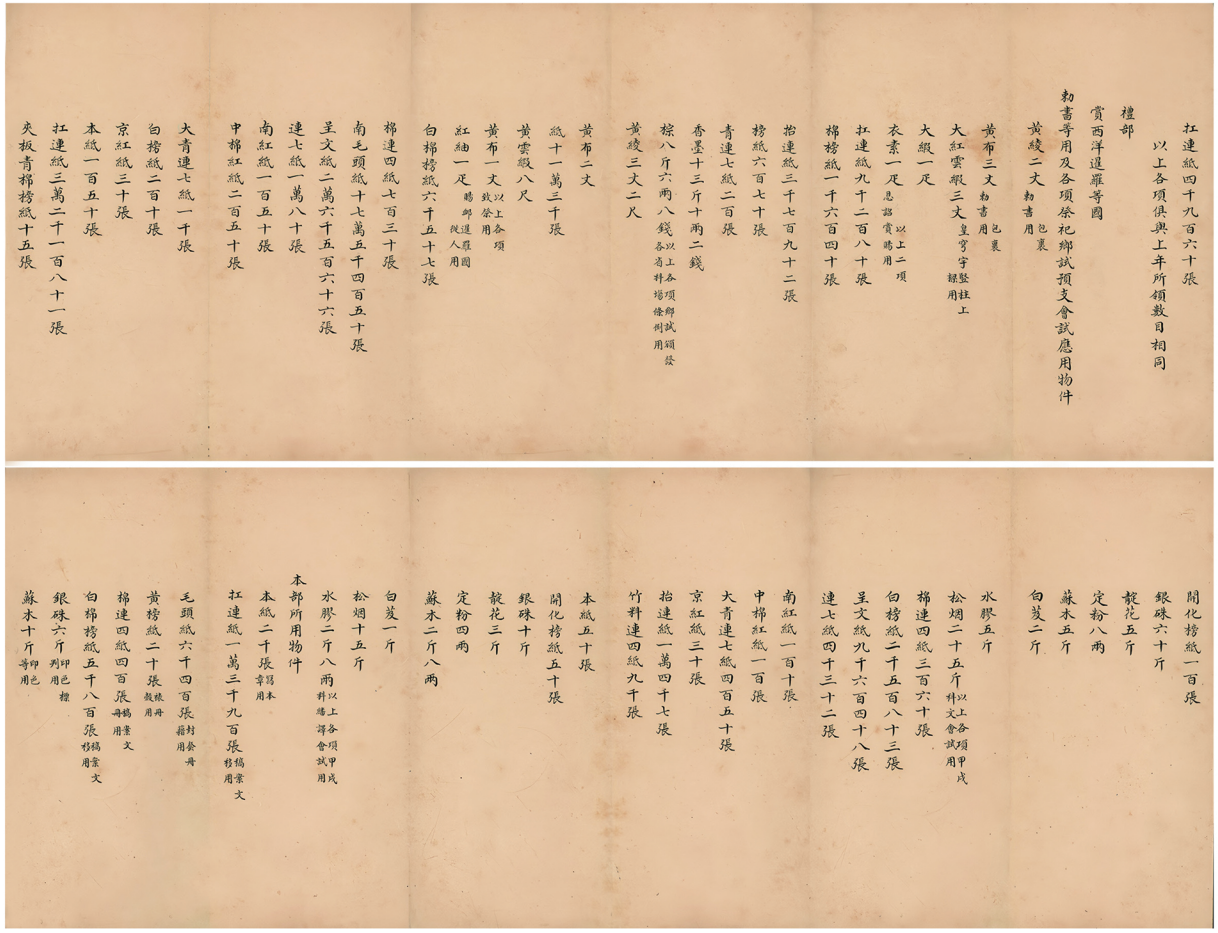
①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第 108 页。

与开化榜纸前后紧挨着并列出现,实为两种不同的纸张。

(四)开化纸也非连四纸。从纸张总折档案记载看,连四纸与开化纸在使用机构、使用数量以及用途上判然有别,连四纸主要用于刷印、装潢殿本书籍等和缮写黄册,少量作为公文用纸;而开化纸主要用于钦天监造时宪书,礼部文科会试和翻译会试也只是少量使用,且不管是在纸张总折档案中礼部所列纸张内,还是户部每年题报的核销纸张等物品的题本内,开化纸和连四纸都是作为独立纸种并列出现的,故开化纸也非连四纸。需要注意的是,纸张总折档案中关于将大量清水连四纸用于刷印武英殿聚珍版书籍的记载,进一步佐证了以往研究者如王传龙、易晓辉等关于文献学领域常被人们称为"开化纸"印制的精美的殿本书实质上是连四纸书的结论。

行文至此,关于文献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开化纸"的上述基本事实均已厘清,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可得以纠正,一些正确的推论则可从源头上给予证明,这也正是清代纸张总折档案在相关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取代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王金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清代科举、档案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九年纸张总折档案（局部）

详参王金龙《清代“开化纸”相关问题再探》一文